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人文论丛

2016年

第1辑 (总第25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人文论丛

2016年

第1辑 (总第25卷)

冯天瑜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论丛. 2016 年. 第 1 辑: 总第 25 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307-18540-1

I. 人… II. ①教… ②武… III. 社会科学—2016—丛刊 IV.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300 号

责任编辑: 李 程

责任校对: 汪欣怡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561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8540-1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人文论丛》2016年第1辑（总第25卷）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池田知久

刘纲纪 朱 雷 李学勤 杜维明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谢和耐

裘锡圭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礼堂 李维武 陈文新

陈 伟 陈 锋 吴根友 沈壮海

张建民 杨 华 杨逢彬 罗国祥

尚永亮 郭齐勇

主 编 冯天瑜

副主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杨 华

本卷执行主编 陈 锋

本卷执行编辑 洪 均

目 录

人文探寻

- 论荀子及其后学对周公的论述 杨兆贵 吴学忠(3)
- 朝鲜王朝的“仁祖反正”与君统礼讼
- 兼论中国儒家礼制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许 颖(14)
- 戴震人性论与孟、荀之异同 张丽珠(24)
- 梁启超的思想转向与其三种修身书
- 兼论梁启超的修身思想 彭树欣(41)
-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 伽达默尔视野中的经典诠释 魏 琴(48)

文史考证

- 上古中国的时间意识、时令文本与时节礼仪 薛梦潇(59)
- 楚“柱国”及相关问题研究 靳腾飞(74)
- 论《磻砂藏》对《思溪藏》随函音义音切的修订 李广宽(82)
- 《安老怀幼书》提要新证
- 《四库提要》新证之一 司马朝军 张晶晶(92)
- 清代长江下游区域的端午节研究 张彦林 萧 红(100)
- 清代传记制作与人物评价
- 以黄思彤各类传记为中心的思考 王嘉乐(109)

文学与文体

- 论李煜生命哲学对其词作的影响 崔 萍 胡 浩(123)
- 张三丰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余来明 陶明玉(129)
- 论明代文言小说 陈文新(135)
- 思想文化进程中的明代八股文 朱燕玲 郭皓政(145)
- 论天河与牛郎织女传说的演进 肖 波(161)

经济、社会与文化

- 幕阜—罗霄山区经济开发历程中的小民生计与封禁政策 陈新立(171)
- 明代府州县城池的多种功能
——以湖广地区为例 孙 兵(183)
- 清代的巡盐御史
——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三 陈 锋(194)
- 深惭事业属虚浮
——清初吏胥生活情状研究 王雪华(213)
- “蝻月”“蚰月”“虫月”考 张建民(223)
- 民国时期河南的县财政与农业经济研究(1912—1937年) 岁有生(236)
- 民国时期两湖地区中农的收支结构 林源西(247)

历史文化语义学

- “不学诗,无以言”考论
——概念史视野下的春秋时代 严学军 孙 炜(265)
- 明末晚清 Logic 的汉译历程 聂长顺 熊展钊(276)
- 概念体系史的研究方法 铃木贞美 著 梅定娥 译(288)
- 傅兰雅对科技术语翻译的理论探索 夏 晶 聂向明(302)

学术评论

- 明清西器东传研究综述 谢 盛(319)
- 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评述 陈 典(336)
- 知识的留存与知识谱系的建构
——从《清人笔记条辨》看张舜徽的治学路向 陈 娟 王 炜(342)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2015年1—12月) 李小花(356)

人文探寻

论荀子及其后学对周公的论述

□ 杨兆贵 吴学忠

一、绪 言

荀子(约前340—约前245年),^①战国时期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传统认为他提倡性恶论,但有学者根据《荀子》文本反对此看法,认为性恶论是他的后学提出的。^②《荀子》一书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荀子手著,有22篇。^③这22篇尽管不免有错简等问题,但它们反映荀子的思想;第二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言行;第三类是荀子所整理、汇集的资料。第一第二类都是研究荀子思想学说的主要材料,第三类则只是间接材料。^④

周公的重要事迹《尚书大传》有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主张,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为周王朝统治奠下基础。他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创建者和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中国西周前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先师。

荀子在阐论义理时,有时论述周公事迹。这对后世了解荀子的思想和周公的史事有重要的价值。下文分别就荀子、荀子后学对周公的论述加以阐述。

二、荀子对周公的论述

荀子所说周公之事包括:周公屏退成王,践履天子之位,平乱、封建,巩固周王朝;周公致政成王,北面为臣;周公为臣,是德才兼备的宰、大忠之臣,时时以德教化成王。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3页。

② 何志华:《〈荀子〉述〈孟〉考:兼论〈性恶篇〉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5年第60期。

③ 它们是:《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天论》、《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君子》、《成相》、《赋》、《性恶》(何志华考证,《性恶》篇非荀子亲著,而是他的后学所为。见上引文)。

④ 廖名春:《荀子新探》,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周公是位圣人。荀子还说了周公的外貌。

（一）荀子说周公践履周天子之位

1. 《儒效》篇

荀子在《儒效》篇提到周公在灭殷、称王的几件大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①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谓大儒之效。^②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山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囚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③

以上三段，荀子说了周公的一些重大事迹：一是周公与武王伐纣，出兵便犯了“兵忌”（冲太岁，遇江水暴涨、城墙倒塌等），三天遭到五次灾祸，霍叔对此很惊恐，认为出师不利，言下之意要回师。那时是宗教迷信笼罩的年代，面对“五灾”而产生恐惧感的，不只霍叔一人，应该在将士中也普遍存在着，这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挫伤他们的锐气和斗志。周公面对这种情形，冷静地从商纣内部形势分析，指出商纣杀比干，囚箕子，让飞廉、恶来执政，内部已分崩离析，现在伐纣是天赐良机！因此，周公没改变伐纣的决心。他的一番话，极大加速了进军的速度，最后成功灭纣。^④二是灭商纣之后，周公制礼乐，治天下，而天下太平。三是武王死了，成王年幼，周公为了系属天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4~115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5~117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4~137页。

④ 游唤民、汪承兴、贾再友、游柱然：《元圣周公全传》，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下，摒开成王，承继武王，履天子之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巩固周王朝。当时人民没有闲言，诸侯们都来效劳，他的威望之高，可见一斑。四是周公杀了管叔，迁走朝歌殷之顽民。五是周公封建诸侯，建立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就有五十三个。六是他等成王行冠礼后，便归周反位。顾颉刚认为，荀子所谓周公称王不在周，而是在他东征时，身当主帅，统筹全局，分遣将领，秉着最高的威权，成了实际的王。^① 周公教诲开导成王，使成王承袭文王、武王的功业，然后他把天子之位还给成王，自己北面称臣。荀子称赞周公传天子之位给成王，不是禅让；成王当了天子，不是夺取，而是“以枝代主”，是由于客观环境权变情势的变化。“这分明说武王死后，武、庚、管、蔡叛变之际，周公无论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都是王；直到他归政之后，成王才做了实际的王。”这叫做“君臣易位”；所谓“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意周公称王本无所谓摄位。^② 荀子特地称赞周公是圣人（大儒）：“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谓大儒之效。”

2. 《王制》篇

《王制》篇推崇周公是王者，所治之国能一统天下：

荀子在该篇里根据君王的德行、推行政策，而把君王、国家分为五等：王、霸、安存之君、危殆之君、灭亡之君；王国、霸国、安存之国、危殆之国、灭亡之国。荀子这种分法，可能受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至”论思想的影响。^③

荀子把周公当成第一等的“王”、王天下之人，可见荀子对周公推崇备至：

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东征而西国怨……安以其国为是者王。^④

荀子只举周公作为“王者”代表，而没有举其他圣君明君，可见周公在荀子心目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荀子认为周公是凭“修政其所”而非用侵略的方法，治理国家，结果天下百姓都希望被他统治，此即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之说。

这里顺便讨论荀子提到的“法后王”。到底“后王”指谁呢？学者对“法后王”约有六种推测。李桂民在《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一书整理了这些看法：第一种是唐代杨倞提出来的，认为荀子的“后王”指时王或近时之王。第二种是清代刘台拱和王念孙提出的，认为“后王”指文王和武王。第三种是章太炎在《馀书·尊荀》中提出的，说“后王”指孔子。第四种是任继愈、张季平等提出的，认为“后王”指文、武、

① 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 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③ 有关先秦五至论的内涵及其与帝道、王道、霸道的关系，详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3页。

周公和孔子（总结、接受第二、三种看法）。第五种认为“后王”指的是包含周成王在内的西周盛世贤王。第六种是陈登元提出，“后王”指夏商周三代圣王。^①

“后王”当指周公。《儒效》篇说：“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②意思是人有以道德来问的，以不外于后王的事告他。道过三代以上叫做浩荡难信，治法外于后王的叫做不正。因为周道是继承夏道和殷商之道，又不应超过夏、商、周三代，因此，“法后王”应该是周道中的人，而最能代表周道的人就是奠定周代礼乐制度的周公。

（二）荀子说周公是德才兼备的宰、大忠之臣

荀子说周公在成王能继承文、武之业后，就归政成王，自己北面称臣。周公为臣，是臣子的理想的典范。

1. 《王霸》篇

《王霸》篇指出周公是德才兼备的理想的相：

《王霸》篇指出君王“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使“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这样，“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君王制礼、善于择贤，“能当一人而天下取”，任用的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王自身安逸，国家治理上轨道，进可成为一统天下之国，次可成为霸国。周成王就任用周公为相，“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③周朝一统天下。

因此，荀子在本篇此处指出：周成王是明君，能重用周公，周公是仁人，则用得其人，所以成王可以“身佚而国治”、“垂衣裳而天下定”。反过来说，周公是位德才兼备的相，能帮助成王治理天下。

《王霸》篇认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君王占据天下之利势，一位有仁德的君王，采取什么的治国措施至关重要，因此，“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遵守王者的办法，就称王于天下；遵行霸者的办法，就能称霸于诸侯；遵行使国家灭亡的办法，国家就会灭亡。另外，君王择相很重要，“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④若择贤用能，国家会一统天下，否则可以倾覆。君王能制礼行义，用人得当，那么，“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尚、周武王用召公、周成王用周公旦云云，说明君王择用贤相而天下治的道理与事实。

① 李桂民：《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70~71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6页。

③ 以上一段《荀子》引文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2页。

④ 以上一段《荀子》引文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2、209页。

2. 《臣道》篇

《臣道》篇说周公是大忠。荀子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①

荀子把臣分为四等：大忠、次忠、下忠、国贼。他在本篇这样看周公：一是称赞周公是大忠，所谓大忠，是“以德复君而化之”，以道德教化君王，使君王接受德化。二是说周公对成王来说是大忠，意即周公在复政给成王后，他当了成王的臣子，而对成王起着“大忠”之效：“以德复君而化之”，周公还不断教导成王。这和《儒效》篇、《周书》所记的周公教诲成王的记载基本相同。

3. 《君子》篇

《君子》篇称周公为圣，成王对周公无所不听。荀子说：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而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②

该篇指出成王对周公无所不听，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可贵的，即知道周公此人是极可贵的。荀子把周公当成圣王，“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议论效法圣王，就知道什么人应该是可贵的。成王知道周公是圣人，所以对周公无所不听。“尊圣者王”，因此，成王能称“王”。可见，本篇所说周公是圣人，同时是成王的臣子。

其次，荀子认为君王尊崇圣人，治理国家，就可称王天下；尊重贤人的，可以称霸天下；敬重贤人的，国家可以保存；轻视人圣的，国家就会灭亡。由此可见，圣人、贤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正是周成王对于周公无所不听，所以国家得以安定、安然统治天下。从中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周公是圣人，是一位治国之人。

《君子》篇旨在论述为君之道，同时强调了君王的权威与作用。文章指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子无妻”、“执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诘，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而要具备并维护这种权威，君王最重要的是要效法古代圣王，用“义”来判断政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4~255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2~453页。

事，即“法圣王”、“以义制事”，按等级关系的准则来治理社会，要“刑赏得当”，不能“刑过罪”、“爵逾贤”，尤其不能按宗族论罪，不能以门第举贤。只有真正做到“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①才能形成巩固、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形成并巩固天子的独尊地位。^②

从以上三篇可见荀子特别重贤，指出“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君子》），比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高卓，孟子只从用贤的有利之处来对君王作出规劝。荀子此文的字里行间里隐隐透出些许警告的意味：君王若不用贤，结局就是亡国，自古至今，没有一个君王能自外于此。其实荀子的目的就是创建他心中理想的社会，上能政通人和，下可各得其所，井然有序。

最后，简谈荀子对君、臣的看法：荀子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在于修身和用人，在为政和用人方面，他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体现在这几方面：第一，确立正确的政治原则。君王所遵行的政治原则，即荀子所说的礼义之统。第二，建立贤人政治，注重相职的人选、重用相。荀子认为君王不能事事躬亲而没有安逸，所以君王必须重用可以胜任的贤人辅佐。第三，荀子主张君王在选拔人才上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即“任人唯贤”的原则和对礼的恪守为标准。只有君王不论亲疏贵贱，唯贤是务，国家才能维持长久。

（三）荀子谈周公其他方面

荀子在《荀子》其他篇章提到周公其他方面，使世人对周公有更多认识。

1. 《非相》篇

荀子在《非相》篇用了大量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批判了相术。他指出周公的身高和外形：“文王长，周公短”，周公非常矮。“周公之状，身如断菑”：周公的样子，身体如同一棵死树桩。^③

也许我们读了这样的文字，对周公的外貌深感意外、失望？他和我们心目中高大的形象是否相去甚远？关中大汉怎么会如此矮小？也许荀子为了反对相术，所以特地也把他心目中的圣者周公的外貌写得如此难看？

2. 《解蔽》篇

《解蔽》篇是荀子阐释其认识论的重要篇章，他指出人们在认识上的通病是“蔽于一曲”，犯了片面认识的错误。这种错误又往往源于人们的“私其所积”、“倚其所私”，只偏爱自己掌握的知识，只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作为依据。荀子列举了夏桀、殷纣、唐鞅、奚齐、墨子、宋子等人受蒙蔽的情况及其产生的恶果，证明了解除蒙蔽的必要。关于解除蒙蔽的方法，荀子提出，最关键的是建立一个正确的标准，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认真地加以比较权衡，以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这个正确的标准，荀子称之为“道”。只要掌握了

① 以上一段《荀子》引文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3页。

② 方勇、盛敏慧：《荀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页。

③ 王忠林：《新译荀子读本》，台湾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66页。

道，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恶有蔽矣哉？”荀子具体说明了掌握“道”的方法是“虚一而静”。^①荀子说：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戟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鲍叔、宁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与管仲齐；召公、吕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②

该段重点指出“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把周公、召公、太公、鲍叔、宁戚、隰朋当作不蔽于“贪鄙、背叛、争权”的代表。因为周公不蔽，所以，周公很有“名利福禄”。可见，荀子把周公当作“不蔽”的榜样。

三、荀子后学对周公的论述

《荀子》最后六篇应是荀子弟子所编撰，其情况与《论语》有些相似处，着重记述师生的言论。^③《大略》篇、《宥坐》篇、《尧问》篇都有记周公之事。《大略》篇记：“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说周公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宥坐》篇只记“周公诛管叔”一事。这三篇记载周公最详细的是《尧问》篇。这篇文章记载几件事，其中之一是伯禽将归于鲁，周公问伯禽之傅有关伯禽的德行。师傅回答说伯禽有三个优点：“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周公批评师傅把缺点说成优点：

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逾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人之道也，女又美之。^④

周公认为伯禽有三个缺点：一是他对人宽大，赏赐就不加分别。二是他喜欢靠自己的才智行事，这使他浅陋无知、胸怀狭窄。三是他谨慎，却使他孤陋寡闻。后两者的结果相同，使伯禽心胸狭隘、孤陋寡闻，不能重用贤能、放眼天下。因此，周公认为师傅没有尽应有的责任，混淆是非。他指出自己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但是他自己是这样礼待贤士：

① 以上可参考方勇、盛敏慧：《荀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0~391页。

③ 张西堂：《荀子真伪考》，台湾明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151页。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8~550页。

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贄而见者十人，还贄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逾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①

周公指出自己求贤若渴，是改变自己孤陋寡闻的不二之方；通过求士，使自己有了是非判断的标准；他着重阐明自己的广求天下士之道：他拿着礼物去拜见的尊长有十位，还礼会见的有三十位；用礼貌接待的士有一百多位，想要向他提意见而他请他们把事情说完的有一千多位。他在这些人中只挑选三位贤士——他不是十人三十人之中挑选贤士，而是在上百上千人之中挑选到这三三位贤士。周公指出对待不同士人，对他们的礼貌要不同：对上等的士人，对他们的礼貌轻些；对下等的士人，对他们的礼貌重些。这样，贤士就八方云集。荀子所要表达的是统治者要抛开故步自封的待士态度，做到求贤若渴，广泛接纳天下之人，并在其中选择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根据历史记载，伯禽的一些治国理念或经验、方法最初似乎未能达到周公的要求，因此周公对他谆谆善诱，教以治国之方。《论语·微子》记周公对伯禽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② 周公提出四点看法：一是君子不怠慢亲族，二是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三是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四是不要对某一求全责备！^③ 其中第二点就是要伯禽重用大臣贤能，这和《尧问》篇所说的相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第一，周公的家教。周公曾为天子，封建诸侯，以屏翼周室，巩固周王朝。他对儿子的教育也离不开这一目标，教授伯禽在履行诸侯之职时，应该注意一些重大举措。周公对伯禽的教导，可视为我国有史记载的家教第一人。《论语·季氏》篇记孔子对其子伯鱼的教育，^④ 通过伯鱼自述，可见孔子家教的一斑：孔子把自己平时关心、研读的传授给儿子，并加以指导。同样，我们看到周公也是这样教育伯禽的。第二，可见周公重视族群关系、重用贤能、不对人求全责备的思想。他自己亦起着很好的示范，如“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惟恐怠慢人才。这举动不仅被后人广为称颂，而且为历代执政者树立了礼贤下士的楷模。

历史证明，伯禽在周公的教导下，终于成功治理鲁国。周公救平武庚、奄之乱后，封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0~551页。此段记周公告诫伯禽当鲁君应注意一些举措，《韩诗外传》卷第三“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章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周公告诉伯禽要以“谦”德治国。《说苑·敬慎》篇所记的内容和《韩诗外传》几乎相同。

②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6页。

④ 《论语·季氏》篇记孔子对其子伯鱼的教育：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见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174页）

建诸侯。由于鲁国地处东夷势力中心，地理位置很重要，加上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因此周公对此特别重视，他在伯禽适鲁就职前多次与伯禽谈话，《论语·微子》、《荀子·尧问》、《史记·鲁周公世家》、《吕氏春秋·贵公》、《说苑·至公》等都有记载。周公教导伯禽当鲁君后，要以公心治国，勤政尚贤，尊重当地风俗，对殷人采取怀柔政策。^①伯禽到鲁国后，切实领会、贯彻了周公的教导，成功治理鲁国，收到屏卫周室的效果，达到封建的目的。

四、后世对荀子论述周公材料的评论

荀子对周公事迹进行论述，尤其是说周公曾代成王而为天子一事，是否史实，有史学的重大价值？后世学者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先简视一下一些宋儒对此事的看法。《荀子·尧问》篇记周公批评伯禽的师傅认为伯禽“好自用”是美德，这会导致伯禽心胸狭隘、孤陋寡闻，进而说明自己热心求贤待士。周公这种求贤若渴的形象，已深入人心。^②但王安石批评荀子不明白法重于人的道理，认为荀子笔下的求贤的周公与三代圣王治道“立善法”的精神相背离：“是诚周公之所为，则何周公之小也！夫圣人为政于天下也，初若无为于天下，而天下卒无以不治者，其法诚修也。”^③王氏认为荀子说周公求贤若渴，不符合圣人善以立法而为政的理想，圣人重视立善法，一立善法，则没必要广求贤士。

程颐批评荀子说周公践天子之位，是不晓君臣之分的大义。他反驳荀子说周公“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周公位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之而已，安得践天子之位？”^④

王安石、程颐等作为宋代理学家的代表，他们对荀子周公论的批评指责，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王安石基于他自己侧重变法的主张而批评荀子称周公求贤若渴，程颐严于君臣之分，批评荀子强调周公践履天子之位一事。^⑤这说明了时代（宋代中央集权、君权高涨等政治因素）、思想（宋儒的关怀重点和先秦儒有些不同）不同，对同样人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同。同时说明：义理与史实有时不可并存，有时一些思想家为了阐释一己之见而不惜扭曲史实，把史事当作阐释义理的工具。这种现象历史上无时无之。^⑥

① 游唤民、汪承兴、贾再友、游柱然：《元圣周公全传》，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3页。

② 三国时期曹操《短歌行》也称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并说自己学习周公，以周公为榜样，希望天下士能帮助自己，一统天下。可见，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

③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2页。

④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⑤ 刘涛：《宋人视域中的〈荀子〉周公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⑥ 如《韩非子》一书有不少关于古史的材料，都是韩非作以阐释其学说的工具。韩非搜集不少有关孔子的言行，把他的言行当作阐释自己法、术、势学说的工具，孔子也就成了韩非学说的代言人，详杨兆贵：《先秦古籍关于孔子论述的分析》，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97~110页。不仅韩非对孔子如此，其他学派如《庄子》也这样看孔子，详杨兆贵、梁健聪：《诸子思辨视野下的孔子形象——庄子及其后学对孔子的论述》（《南都学坛》（人社版）2014年第5期）。蒙文通先生认为诸子对同一古史有不同的看法，是由于地域不同，所以观念有异，思想家对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有不同阐释。他认为古史主要有海岱、三晋、南方（即鲁学、齐学、晋学、楚学）的不同，这三大地域就有明显的不同的思想观念。详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88~98页。